

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出版

高 梧 ● 著

文昌信仰

WENCHANG XINYANG XISU YANJIU

习俗研究

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

中国民间信仰与民俗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集

中国民间信仰

文昌信仰 习俗研究

中国民间信仰与民俗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集

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出版

文昌信仰习俗研究

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五”规划项目

巴蜀书社
四川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昌信仰习俗研究 / 高梧著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 2007
ISBN 978-7-80752-037-5

I. 文… II. 高… III. 风俗习惯—研究—梓潼县
IV. K892.471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3207 号

文昌信仰习俗研究

高梧著

责任编辑	李 嘉
封面设计	何东琳工作室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.cn
发 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(028)87487333 电话:(028)85011398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	210mm×148mm
印 张	8.25
字 数	210 千
书 号	ISBN 978-7-80752-037-5
定 价	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序

民俗是一种社会现象，凡有人类群居之处就会积久而形成某种民俗，可以说民俗是随社会存在而存在，无论历史或未来它都是当时当地的客观事实。人类社会的诞生、发展和演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，既有承袭也有变革，它是一个没有止境而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。至于民俗的产生和发展，大致也循着这样的历程而显出其阶段性和地域性，具体到某一民族、地区和国家，更因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呈现千差万别。民俗的出现和演进，尤其是影响范围广阔、人群众多的民俗，在民间社会已形成巨大而不可忽视的力量，这就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切，所以民俗的研究也随之应运而生。民俗研究的深入发展，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知晓民情，促成了彼我间的情感交流，人群共处亦因相互间的沟通而归于和谐。可以说民俗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，而社会的繁荣昌盛也为民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实为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。

我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历史悠久，拥有五十几个民族，经长期和睦融处，已成为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大家庭。这些基

本国情反映在民俗方面，就会出现“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”的地域差异性；因人口、民族众多及生产生活方式的不一，使民间的风情风貌各具鲜明特色，故其民俗又显出固有的多样性；而文明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，文化积淀厚重，因而民风民俗的形成又呈现不同的阶段性；更以文化心理的大同，使族群间的民俗互为吸收和融通，故中华民俗不仅显出其千姿百态的风貌、地域的差异和时段特色，而且还可明显看出其间的相融性、连续性及其承袭发展。

就中国民俗历史而言，我们可以把民俗的起源追溯到遥远的邃古，然而更重要的是应当掌握什么时代提出了民俗问题。“民俗”一词的出现，应是人们自觉意识到民俗的发端。据我所知，殷末的周人已开始注意到民俗问题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，文王西伯弘扬古公仁爱民众的传统，故周人区域内民风和善，吸引了四邻部族的归附。其文云：“西伯阴行善，诸侯皆来决平。于是虞、芮之人有狱不能决，乃如周。入界，耕者皆让畔，民俗皆让长。”战国人著的《缙衣》提出：“君民者，章好以示民俗。”这里进一步指明，统治者应当从政策上“章好”以引导民俗。我国以礼乐文明著称于世，而礼乐的彰显又以周代为盛。周朝设“采诗之官”，从歌谣里来“观风俗，知得失”。著名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其中的十五国风多采自民间口头歌谣，是典型的民间文艺，也是各地民俗的丰富素材。所以郑玄在《毛诗周南召南谱》里说：“武王伐纣定天下，巡守述职，陈诵诸国之诗，以观民风俗。”采诗观风，本是周人的传统。《礼记·王制》说到天子巡行天下时，要“命大师陈诗，以观民风”。《孝经》广要道说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；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”可见风俗的和善与

礼乐的隆兴，其间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清人陈启源阐发“风诗”的意义说：“风俗之风，正当国风之义矣。然必有风教，而后风俗成，有风俗而后风刺兴。合此三者，国风之义始备。”从这些论说中，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儒家民情风俗观的轮廓。至于道家则主张因顺自然，所谓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。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说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这是“贵因”说的民俗观，如果民众都因顺自然，则各“安其居，乐其俗”，此即道家所憧憬的人间乐国。其外，以神话故事述说远古风情和英雄事迹的如《山海经》、诸子等文献，也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先秦时的风土民俗。

我国入汉以后，民俗研究进入了发展阶段，对民俗的专注人士逐渐增多，因而有关民俗的著述成果也频见于世。西汉《淮南子》中的《齐俗训》，是理论上专篇讨论民俗之始；东汉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是理论上专书讨论民俗之始。虽其论述不能和现代意义的民俗学相比，然就古代意义的民俗学而言，毕竟为后此的民俗研究开创了新局。《齐俗训》承认各地“殊俗”，但可以互相包容，主张因其俗而同之。它认为民俗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而不是与生俱来的。各地风俗确有差异，应当彼此尊重，但也要因时而变，所谓“世异则事变，时移则俗易”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应当移风易俗，因时制宜。这些民俗观点，在今天看来仍是可取的。《风俗通义》从时间角度总结了先秦以来观风察俗的理论和实践，从空间方面收录记载了各地的风土民俗，其内容相当广泛，包括市井礼俗、民间信仰、姓氏称号、岁时年节、祭祀和禁忌等，为我们保存了丰富多彩的民俗资料。它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述各地不同民俗风情，此实开后世

方志记录民俗之先声。扬雄《方言》是我国第一部收录古今方言的词书，其目的是要会通诸方雅俗之语，裨利各地域之间的语言思想交流，对研究语言民俗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至于王充的《论衡》，其中卷二十二以下如《纪妖》、《订鬼》、《言毒》至《难岁》等十篇，较多地记载了当时的民风民俗。如十二生肖的最早记录，据我所知是始于《论衡》的《物势》和《言毒》，可检视原书，此不具述。民俗研究两汉开启风气，后此如《陈留风俗传》、《南裔异物志》、《南州异物志》、《北荒风俗记》和《诸蕃风俗记》等，迭见于诸史艺文志和唐宋类书。其时最有名的是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，这部时代较早记载地域岁时年节的专书，对我们研究一方年节生活民俗很有参考价值。

唐、宋以降，国家长期处于强盛和统一局面，各民族交相融合的步伐加快，民间习俗则互为吸引，取长补短，因而族群间亦更为亲近融洽。在这历史大背景下，民俗的记录及研究也显得盛况空前。据两《唐书》经籍、艺文二志所载，既有《诸郡土俗物产记》十九卷，更有包载风俗的地理总志如《括地志》五百五十卷。《括地志》虽佚，然这类大部头书的问世，应是盛唐民俗文献汇集成果的标志。现存唐人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于各郡州县多记该地民俗，此例为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、《方輿胜览》和《輿地纪胜》所遵循。以上诸书的体例，为明清纂修地方志提供了范式。唐宋以来，城市经济发展较快，市井民俗亦显现不同色彩。应时而兴的著述，则有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都城纪胜》、《西湖繁盛录》、《梦粱录》和《武林旧事》等书。其中有记开封的娱乐场所盛况，如可容数千人的“瓦子”、“勾栏”，民众常拥入听说书人讲三国，还有的去欣赏各类唱曲，离去时兴犹未

尽。而反映杭城市生活的如《梦粱录》，记述该城的买卖“昼夜不绝”，可见南宋时临安的繁荣，市民实生活在不夜城中。

唐宋自明清时期，无论官府或私人对风土民俗都十分重视，并且见之官书文典和私家著述，这表明民俗研究的主体日益扩大，其研究成果更为瞩目。《唐六典》规定：京兆尹及各州刺史“每岁一巡属县，观风俗，问百姓”；诸县令“掌导扬风化，抚字黎甿”。这是用国家法典的形式明确规定地方长官，必须考察治下的民风民俗，并加以导扬教化。此种精神为后世所承袭，下至明清相沿不改。《清朝通典》卷三十四规定，各县知县职责是：“掌一县之政令，平赋役，听治讼，兴教化，厉风俗。”至于中央有关部门，亦须掌握知晓风土民俗。《宋史·职官志三》规定礼部在接待“四夷”民族时，须“图其衣冠，书其山川风俗”；兵部则应对其“土地所产，风俗所尚”，并及“古今兴废之因”等，都要作出记录及造图进呈。朝廷任用地方官员，要考究他是否“谙其民俗”，“谙其民风”。士人在任或卸任后，亦多著述有关风土民俗之书。史家中远者如司马迁，据张骞使西域所述而作《大宛列传》。唐太宗命韦机使西域，韦机记录“所经诸国风俗、物产，名为《西征记》”。回朝时，“太宗问诸蕃中事，机因奏所撰书，太宗大悦”。唐德宗时，袁滋奉使南诏，著《云南记》五卷；继袁滋而赴南诏的樊绰，据其历见及所闻著《蛮书》十五卷。樊书内容包括“六诏始末，诸种名号，风俗条教，土宜物产”等，该书对于研究云南历史及风土民俗，迄今仍是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献。再如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、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等书，专记殊方民俗，为我们了解两广南域的土俗风情，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。唐宋以来的说部书，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前集、续集

共三十卷，所记礼异、境异、喜兆、祸兆、谗习、怪术、艺绝、酒食、物异、冥迹和尸窆等内容，是一部记述当时社会民俗的奇书，它拓展了民俗研究的视野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四二誉其为说部之“翘楚”。继后有宋人洪迈《夷坚志》、清人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和翟灏《通俗编》等，亦多记社会民俗或地方民俗，皆有资于研究彼时彼地之风俗民情。

明清以来，学人承唐宋风气继续弘传，其时海路渐趋畅通，更使人们的眼界大开，期望走出思想上的自我封闭状态，开阔民俗研究领域之作而随之大增。晚明徐弘祖撰《徐霞客游记》，凡六十余万言，皆其亲身游历及亲见亲闻所录。潘耒序其书云：霞客足迹所至，遍及“闽、粤、楚、蜀、滇、黔，百蛮荒徼之区，皆往返再四”。尤其是他在粤西、黔、滇“诸土司蛮部间，沿溯澜沧、金沙，穷南、北盘江之源”，撰成《江源考》，纠正了历世“岷山导江”之误。潘耒还说：其书“山川条理，胪列目前；土俗人情，关梁阨塞，时时著见；向来山经、地志之误，厘正无遗。”《徐霞客游记》之价值，固在其对山川地貌之科学考察，然其对边徼荒远之地的风物民俗记录，皆其“足迹所经，排日记载”，且“耳目所亲，见闻较确”，实为别开生面之游记体民俗史料，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，将其纳入民俗研究视野。明清之际，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，他纂集多种资料而成《肇域志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后一种凡二百万字，所载以各地兵要、赋税、水利等为主，但仍兼收土风民俗。他在序中说：其书虽“多往代之言”，然于“地势民风”亦多注意，遇不当之处，则存疑以俟刊正。在考据实学风气影响下，清人所修一统志、省通志及府、州、县志，其类目也包括有民风民俗。以《嘉庆重修

一统志》为例，其所列二十五目，风俗排列于沿革、形势之后，而在城池、学校之前。《一统志》是修志的范本，各地修志无不遵其例而收入民俗内容。从此，民俗研究资料亦更加丰富充实。

晚明利玛窦来华，西学东渐之风拂及我国，入清后边事迭起，继以道、咸外侵而致国危，朝野人士目怵心悸。在此国情背景下，兴起了边陲地理和殊方异域的研究风。其中如张穆《蒙古游牧记》、何秋涛《北徼彙编》、刘统勋《西域图志》、和宁《回疆通志》、祁韵士《西陲要略》、《皇朝藩部要略》、靳治扬、王璋《台湾府志》、蔡麟祥、林豪《澎湖厅志》及盛绳祖《卫藏图志》等数十种。其时，为了解异域海国而编撰成书的，亦复硕果累累，其中最著名者是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。魏源在其《叙》中说，此书原据林则徐所译《四州志》，“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夷图、夷语”，于东南洋、西南洋“增于原书者十之八”，于大西洋、北洋“增于原书者十之六”。其自述著意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故内容重在政治、军事、兵器等方面，然于土风民俗、信仰和科教亦多有记述。魏源再三强调：“知己知彼，可款可战；匪证奚方，孰医瞑眩？”可见该书的宗旨是：要求国人对彼方的政情、军兵和民俗、宗教等，应作全方位的了解，然后才能“可款可战”。此前，清人图理琛使俄归，撰《异域录》；陈伦炯出身水师，随父往来东西洋，谙熟海国夷情，乃撰《海国闻见录》。陈书对“外番民风物产，一一备书”，而其所书乃“积父子两世之阅历，参稽考验，言必有征”。与魏源相后先的徐继畲，以长期从事口岸通商事务，熟知海夷国情，乃撰成《瀛寰志略》十卷。该书对海国地理山川、军旅兵器和风俗民情皆有较详记载，且罗列相关数字，颇具参考实用价值。《瀛寰志略》和《海国图

志》是晚清以来国人了解海外国情的基本书籍，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对两书评价甚高，认为“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，实自此始”。

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俗学（Folklore），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，则兴起于20世纪初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前后，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，以民主、科学相期许，寻求国家独立富强之路。其中一个重要途径，就是引进和吸收西方科学（包括人文学科）。自英国学者汤姆斯提出以民俗学（Folklore）取代“民间文化”的旧说后，逐渐为各国学者所认可，民俗学这一新的学科名称乃得以成立。1918—1920年，我国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，不久改名为歌谣研究会。后又发行《歌谣》周刊数十期，其后还成立了民俗调查会等。1927年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宣告成立，举办了《民俗》周刊，并出版多种民俗丛书。1930年，中国民俗学会于杭州成立，出版有《民俗月刊》、《民间风俗文化》等多种书刊。1937年以来，我国进入民族抗日战争时期。那时，党中央指出文艺要有明确的方向，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。在正确方向的指引下，各地随即出现了许多以抗日为主题的反映民间抗战故事的各种作品，并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广大民众，这大大地鼓舞了全民抗日的斗争意志，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。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推动下，它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文学的发展，使抗战时期的民间文艺呈显出蓬勃的生机。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声中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，从此，我国的民俗学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。1950年，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，由郭沫若任理事长，老舍、钟敬文任副理事长，继而出版《民间文学》月刊，发行约百余期。后以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民俗

学研究处于沉寂状态。1976年以后，在党中央“改革开放”方针的推动下，我国各方面包括学术领域在内皆显现出新的气象。大学重新恢复了民俗学科目，各地举办了以民俗学为主题的研究班，高校及科研机构还陆续招收培养该学科的研究生。1983年，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，钟敬文被推为理事长。这三十年来，我国民俗学欣逢良好机遇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民俗学者矢志耕耘，因而硕果累累，有关的刊物、专著和丛集等纷纷出版问世，这显示民俗学研究的前景无限光明。

当前，我国民俗研究正在走向深入，其趋势显出更加专门化、类别化、区域化和主题化；就所见论著而言，学者的研究特点也越来越具化、细化和深化。从学风溯源，可以看出他们是沿着先辈学人开辟的路径在继续前进。如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北京妙峰山香会研究，钟敬文的金华斗牛风俗研究等。更有继承早年征集歌谣的传统，如抗战时期的何其芳等编集了陕北民歌，同时有新歌剧白毛女等多种民间文艺创作应世。新中国诞生后，显现国家统一局面、具有全国性的民俗作品集结，如歌谣、谚语和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出版；尤其是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各兄弟民族的作品，如《中国苗族古歌》、《阿诗玛》（彝族）、《格萨尔王传》（藏族）、《江格尔》（蒙古族）和《玛纳斯》（柯尔克孜族）等，皆陆续整理翻译出版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当前的民俗研究确实是万紫千红，满园春色。它表明我国民俗学、民间文艺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好时代。

现在，我面前所读绎的这部关于民间信仰的民俗研究著作，是高梧同志精心结撰的《文昌信仰习俗研究》，它是一部很专门化的、富有时空观的、以民间信仰习俗为主旨的论著。忆想我十

年前出版过一部《巴蜀道教碑文集成》，收碑四百余通，其中有关文昌的碑文亦达五十六通。当时就想到四川梓潼乃文昌之发祥地，历代文献记述颇丰，加之各地文昌宫庙遗迹尚可寻觅，碑碣文字更是文昌信仰传播其时其地的珍贵记录，如能广泛搜讨整理，究其来龙去脉及时空变迁，再予分析综合研究，则数千年来之文昌信仰历史及其所折射之政经、文化诸方面，则呈现于我们前的不特是一部文昌信仰史，还将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人文社会史。今天，我读过高梧的这部书后，乃觉其中新意迭出，富有真知灼见，因而夙愿顿释，感悟良多，故略陈己见，以公诸同好。

首先，该书历史地追溯文昌信仰之源，从纵向上探究文昌信仰的起点。就近世以来研究结果，其认知莫不以《华阳国志》卷二梓潼郡所载张恶子事为之始。然而文昌信仰的千百年流传中，其形成或滋生、派衍存在诸多因素。简而言之，则有文昌星辰说、北斗魁星说、奎宿主文说、斗星首占说及道教神化说等，可谓不一而足。高梧面对众说纷纭之见，能博综群籍，厘清众说，缜密辨析，择善而从；或断以己意，亦言必有据，时出新见，令人解颐。如梓潼七曲山文昌大庙以张恶子（或张亚子）为首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〇三作“蜀人张育”起兵击秦，自号蜀王，时为晋孝武帝宁康二年（374）。《十六国春秋·后秦录二》系张恶子与姚萇寝语事，在萇随杨安伐蜀之年，时则宁康元年（373）。可见传说之张恶子或张亚子，与史书之张育当为一人。《华阳国志》成书在成汉亡（347）后，结合史籍所载其人其事，故传说中的梓潼神张恶子的成型年代，必在公元347年之前无疑。高梧书的独到处在于能开辟新的蹊径，从文昌信仰的发生踪迹去考察寻觅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、《汉书·天文志》载明“戴匡六星曰文

昌宫”，即上将、次将、贵相、司命、司中和司禄。最后之第六星司禄，其功能则如《春秋元命苞》所说是“司禄赏功进士”，汉人依天人相应来思维，这“赏功进士”就成了文昌的神圣职责。民间继之以神化，文昌神便逐渐趋于定型，这自然是一漫长的历史过程。高梧的研究不停留于此，而是以《史》、《汉》为坐标，更进一步上下求索。其上追先秦典籍，如《诗经·棫朴》、《周礼·大宗伯》祭祀有“禋燎”祭星之典，所祀即文昌星。该书下考汉人应劭《风俗通义·祀典》，亦明确指出是“文昌下六星也”。从信仰的发生历史而言，文昌信仰追至先秦是有据可考的。如再旁及“善板”祀雷神，梓潼五妇山化蛇诸神话传说，则梓潼神信仰发生之踪迹，其事亦当远在先秦、两汉间。故综观文昌梓潼信仰的发生历程，就其原始不可断在晋世。此后如唐封之为顺济王，宋真宗四年咸平封英显王（《隆平集》卷三），元朝则加封帝号，文昌梓潼帝之信仰乃随科举盛行而益显于世。至于列于官方祀典，可溯至唐宋，入清嘉庆六年则颁列朝廷祀典，咸丰六年谕旨“文昌帝君应一体升入中祀，以昭诚敬”（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卷一五七）。文昌信仰千百年来之史迹，虽错综复杂，繁难纷纭，然读高梧书后顿觉条理清晰，而有一览无余之感。

其次，文昌信仰的传播地域非常辽阔，其扩散范围需要从横向进行扫描，逐地考察，广集史料，通盘清理，经整合分析后，始可得出可信的结论。朱熹曾言梓潼神、灌口二郎神，其地立庙，多显灵异，如今二个神几乎“割据了两川”。大学者朱夫子对此也感到惊奇，令人费解，可见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。高梧书不特重视文昌信仰的纵向时间轨迹，同时也不畏繁难，从横向空间去进行探索，广览方志，逐步推进，占有传播扩散资

料，以便如实地评估文昌信仰的广度和深度。其书辟有专章研究文昌信仰对儒、释、道的影响，由此可以窥知社会各层面之向度。更于地方志中网罗搜索，由各地所建文昌宫庙及其碑文，考见信仰之传播区域，可谓逐城占有，实地详察，使人觉其是信史无疑。此外，高梧对梓潼石牛镇的文昌信仰予以个案研究，这样的微观考察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因而也是值得效法的。该书还对文昌在兄弟民族、港台及海外的传播情况，更有专题论述，国内过去虽有一些研究成果，但总的说来比较薄弱。高梧之书是博观约取，既广聚史料，又别具史裁，识断皆自己出。这种有系统，有见识的研究，使该领域薄弱环节得到弥补，堪称难得之佳作。因此，我认为高梧书中关于文昌信仰传播之地域论述，空间清晰，见解可信，览其书则各处之信祀活动，皆了如指掌，尽收眼底。

其三，文昌信仰习俗是随人文社会而伴生，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。因此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必须引入文化学理论，以开阔其研究视野，将信仰纳入大文化领域，才能高瞻远瞩去透析信仰所涉诸问题。我看了高梧书后，觉其不仅注意文献和田野的二重论证，而且能从文化学的视角，对文昌信仰作出有理论高度的评价分析。该书有“文化与经济”增长之关系，及其在此关系下的文昌信仰等专题研究，将文昌信仰推进至现代文化轨道。书中认为文昌信仰习俗的核心是文昌信仰，但亦须重视相关的如庙会、洞乐、戏剧、年画、木刻和敬惜字纸等习俗，这些都是灿烂多彩的中国民间文化。通过对文昌信仰习俗的各方面研究，要将其成果推上经济发展的前台，从而使信仰文化成为繁荣经济的推手。此一观点不仅具有现代意义，而在信仰文化研究上也颇富新意。我们以往偏重在文化的意识形态一面，这固然是不错的，但在上世

纪国外已将文化提升至文化产业，应时而兴起了文化经济学。产品中的文化含量越高，其创造经济效益的含金量就越大，因而世界五百强企业已倾注于企业文化的打造，尤其是旅游行业更竭尽全力将看点的自然景观转到人文景观，强调其厚重的历史文化。所以，我认为高梧的这部《文昌信仰习俗研究》，是一部民俗信仰史论兼综的研究专著，它涉及民俗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和文化学等诸多领域，需要著者有多学科的专业修养，始可撰成这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。我看完该书后，喜其成果面世，且造诣精进，乃不揣简陋，而乐为之序。

龙显昭

2007年8月3日